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一〇四期
2025年11月　　頁113~155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511_(104).04

臺靜農「國立編譯館時期」的閱讀視野與雜文書寫*

梅　家　玲**

摘　要

本論文經由爬梳臺靜農家屬捐贈給臺大圖書館特藏的大批書信、手稿等資料，就其任職於國立編譯館期間的閱讀視野與雜文書寫進行考掘，深入釐析臺靜農從新文學創作者到古典文學研究者之間的轉化過程。根據新發掘的各種資料，本文指出：「國立編譯館時期」的史料整理工作，促成了臺靜農日後治學與為文的「史料轉向」，它為渡海前的臺靜農開通了廣納史料文獻的治學之道，讓這位曾經戮力於新文藝的青年作家重回歷史傳統，從而融會轉化，逐漸醞釀出會通古今的文學研究與書寫實踐。撰寫於此一時期的系列雜文「白沙讀史箚記」，則上承明清以來的文人讀書筆記，下啟《龍坡雜文》中的談文論藝之文，並為臺靜農在編譯館時期的「讀史」，銘刻下感時憂世的時代印記。

關鍵詞：臺靜農　國立編譯館　史料轉向　白沙讀史箚記

2024.07.26 收稿，2025.05.19 通過刊登。

* 本論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史識與詩情：臺靜農的「文學史」與「文學／史」書寫】（111-2410-H-002-245-MY3）部分研究成果。撰寫期間，承蒙臺大總圖書館蔡碧芳小姐協助蒐集提供館藏「臺靜農特藏資料」，另蒙審查人提供修訂意見，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Email: meicl@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Literary Preferences and Miscellaneous Writings of Tai Jingnong during His Time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Mei, Chia-ling *

Abstract

This paper reexamines Tai Jingnong's literary preferences and miscellaneous writings during his term of employment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y investigating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letters, manuscripts, and other materials donated to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by Tai's famil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explicates Tai's academic and literary transition from being a writer of New Literature to a scholar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Drawing on recent findings from a wide range of archival source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ai's work experience of organiz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during hi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eriod" contributed to his later academic and literary pursuits of a "historical material turn,"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Tai's incorporation of diver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ources into his research approach before his relocation to Taiwan. As Tai was a young writer who had once devoted himself to New Literature and Art, his work experience facilitated a return to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gradually reshaped his literary style and practices that encompassed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world. Tai's series of essays—*Notes Taken while Studying Histories at Bai Sha*—written during his time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not only echoes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Notes in the Ming-Qing period,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his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Long Po Miscellaneous Writings*. As such, Tai's experience of "studying history" during his work period was engraved with his strong sentiments and anxiety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cultural upheavals of his era.

Keywords: Tai Jingno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 turn, *Notes Taken while Studying Histories at Bai Sha*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meicl@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臺靜農（1902-1990）是五四一代渡海來臺之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兼具文人、學者、教育家、藝術家多重身份。他早年投身新文藝與文化運動，1920年代即以《地之子》、《建塔者》等鄉土寫實小說見重於文壇，另兼及新詩、雜文、劇本之作，深得魯迅（1881-1936）賞識。抗戰期間避難四川，除了雜文、學術論文及「中國文學史」相關書寫之外，亦開始寫作舊體詩，完成長篇小說《亡明講史》；同時開展書法、繪畫、篆刻等藝術創作。1946 年赴臺灣任教，致力於教學、研究之餘，多以翰墨篆刻自娛，成為 20 世紀最重要的書法家之一。他間作懷人、論藝之文，所結集之散文《龍坡雜文》與多年積累的學術著作《靜農論文集》卻遲至 1988、1989 年才出版。雖然持續寫作舊體詩，始終秘不示人，及至暮年始在弟子友朋間流傳；至於新詩與小說，則完全封筆。來臺前，他與魯迅、陳獨秀（1879-1942）的師友關係、他曾經的左翼理想與革命熱情，更是諱莫如深，絕口不提。以致於，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兩岸對於臺靜農的認知彷彿截然不同的兩個人：大陸方面，視其為現代文學家；臺灣方面，他則以大學教授、古典文學研究者與書藝家的身分備受尊崇。來臺前後的文學創作與研究，也似乎存在著一定的斷裂與分流。此一奇特現象，適所以見證了時代的風雲動盪，並體現臺靜農本身在藝文創作與學術研究方面的豐厚多元。1980、90 年代以後，政治解嚴，兩岸交流開放，臺靜農的各類著作隨之先後出版，相關研究，於是益趨多樣化與全面化。[1]即或如此，其中卻有一個很大的盲

1 早年臺靜農的相關研究多聚焦於《地之子》、《建塔者》、《龍坡雜文》等單篇作品或作品集，間亦不乏評析其書藝之作。臺靜農逝世之後，林文月輯錄各界追思懷念之文，併及施淑、張淑香、樂蘅軍、方瑜等人論析臺之文學思想、雜文、小說、古典詩的論述，合為《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臺北：洪範書店，1991），算是初步以相對全面的方式，呈現臺靜農的師友關係、人生際遇、文學及書藝的學術意義。此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包括何寄澎，〈敘史與詠懷——臺靜農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稿書寫〉、齊益壽，〈冰雪盈懷絕世姿——臺靜農師魏晉文學史稿讀後〉，俱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頁 159-182、頁 229-262；《亡明講史》研究有王德威，〈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廖肇亨，〈「只有漆黑」——《亡明講史》及其相關問題〉，俱收入臺靜農，《亡明講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 vii-xxiii、xxv-liv。此外，王德威，〈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1 期（2009 年 12 月），頁 1-46，結合臺的書藝與詩、小說等文學書寫，以相參互證方式進行全面性論析；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就臺之平生及學術藝文活動進行極其嚴謹之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區，始終未曾被學界關注——那就是，抗戰時期，他任職於「國立編譯館期間」（1939 年 9 月-1942 年 10 月）的學思關懷及文學書寫。[2]

渡海來臺之前，臺靜農曾舉家入川，在江津白沙度過九年的戰時歲月。他先入職國立編譯館，擔任編譯及編審，之後轉赴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一般對於臺靜農川中時期的關注，多集中於他的舊體詩作《白沙草》、他在師院期間的任教狀況及師友互動。主要原因，是有不少具體的文本資料可供參考。無論《白沙草》的抒情詠懷、師院同事間的書信往還，抑或日後種種追憶文字，都有助於勾勒臺靜農此一時期的生活點滴與情志寄託。相對地，他的「國立編譯館時期」，則除了與陳獨秀的往來猶有書信可憑之外，似乎就再無可資稱述之處了。[3]

然而，回到臺靜農個人的創作與研究，他之所以在渡海後幡然轉向，難道只是政治因素使然？在此之前，他是否歷經過一定的學思積累與書寫操演？尤其，編譯館的工作性質原就在閱讀、編纂大量文史資料，我們能否經由探勘臺靜農在國立編譯館時期的閱讀與書寫軌跡，就此開展進一步探討？因此，以下即藉由爬梳臺氏家屬捐贈給臺大圖書館特藏的大批書信、手稿、剪報等資料，就臺靜農任職於國立編譯館期間的閱讀視野與雜文書寫進行考掘，以回應前述

年考釋；這些都是 21 世紀以來的重要研究成果。晚近亦有研究生以之為學位論文主題，並多有新意者，如賴柏霖，《臺靜農先生小說研究》（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齊益壽先生指導，2019）、許霖，《鶴唳猶傳建塔心：臺靜農的文學與思想》（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彭明偉先生指導，2023）等。儘管偶有論及臺在白沙時期的師友互動，但多著墨於師院任教時期，對於「國立編譯館時期」，皆不曾觸及。

2 黃立斌曾爬梳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所收藏的臺靜農資料，撰寫〈臺靜農在「國立編譯館」〉一文，刊於《隨筆》，2022 年第 6 期（2022 年 6 月），頁 54-63，是現今最早關於臺靜農「國立編譯館」時期的研究。該文以勾勒臺在編譯館的工作性質與生活狀況為主，其它方面，猶未及深論。

3 臺靜農初抵江津後不久，即與陳獨秀結識，此後互動頻繁。時當陳獨秀抱病撰寫《小學識字教本》，舉凡資料之查核、出版付梓前之與國立編譯館往來商榷，皆託請臺靜農協助。而臺靜農則將自己剛完成不久的「晚明講史」初稿呈請陳獨秀斧正，陳也提供諸多意見。諸如：「晚明講史」不如改名「明末亡國史」，「修改時，望極力使成歷史而非小說」（見陳獨秀 1940 年 10 月 14 日致臺靜農信函，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567）。其間的往來點滴，俱見於陳獨秀致臺靜農的數十封信札。這批信札一直為臺靜農所珍藏，並且攜帶來臺。臺辭世之後，由臺靜農先生遺稿及珍藏書札編輯小組編輯後付梓，見陳獨秀著，臺靜農先生遺稿及珍藏書札編輯小組編，《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提問，並嘗試為現今的臺靜農相關研究，開啟不同於既往的觀照視角。

二、臺靜農珍藏的書信、手稿與他的白沙九年[4]

臺靜農的一生幾乎跨越了整個二十世紀，整體看來，如果「渡海」是界分其人生經歷的重要分水嶺，那麼，渡海之前的九年白沙生活，無疑是他個人生命及學思歷程中深具意義的轉折期。它的重要性與特殊性，首先可從臺大圖書館所收藏的各種特藏資料而見其一斑。

臺靜農辭世之後，家屬將其生前所珍藏的大批文稿資料捐贈給臺大圖書館，若干門生故舊也先後捐贈相關藏品，品類繁多，至少包括了書信、剪報、各類證件、各單位聘書、往來公函、課程綱要、課程講義、考試題目、未曾發表的創作、論文大綱、論述文稿、讀書札記、借書單、書畫、照片，以及所抄錄的各種研究資料等，洋洋大觀，不一而足。綜括而言，除書畫照片及各類公文證件外，文字藏品可歸納為「書信」與「手稿」兩大類，仔細檢視，以下現象特別引人矚目：

首先，臺靜農所收藏的大批昔日信札，除了得自父親臺肇基（?-?）與自家兒女親人的百餘通家書之外，實以渡海前即已多所往還的若干師友信函為大宗；與白沙經歷相關者，為數尤夥。它或是初抵臺灣不久後，與昔日川中友朋互通音訊，或是在川期間，與師友往來論學。其中來自於陳獨秀的數十通信件，正是最具代表性的犖犖大者。[5]

這大批信件中，極少入川前的來函，其原因，或許是戰亂流離，難以隨身攜帶保存之故。[6]衡諸臺靜農在臺的交遊情況，與之往來通信的友人門生及藝文界人士原應不計其數，最後為其珍藏並進入特藏資料者，數量卻不及當年川中諸師

4 臺靜農於 1938 年秋到達四川，寓居江津白沙，先後任職於白沙的國立編譯館及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抗戰勝利之後，於 1946 年 10 月赴任臺灣大學教授，離川之前，曾撰有〈離白沙口號〉一詩：「白沙市上酒人眠，白沙江放野人船；平生漫說塵中老，華髮江鄉住九年。」詩末並註記：「一九三八年秋入蜀，寄居江津縣之白沙，至一九四六年秋離去來臺，是在白沙有九個年頭也。」參臺靜農，〈離白沙口號〉，許禮平編，《臺靜農詩集》（香港：翰墨軒出版公司，2001），頁 37。按：1938 年秋至 1946 年秋，實際時間應為「八年」，今從其自述，將 1938 與 1946 各計一年，合為「九年」。

5 這些師友包括早先即已熟識的沈兼士（1887-1947）、陳垣（1880-1971）、李霽野（1904-1997）、魏建功（1901-1980）、柴德賡（1908-1970），也有入川後才開始往來的黃淬伯（1899-1970）、舒蕪（1922-2009），以及白沙時期的學生濮之珍（1922-2023）等人。

6 入川前的信札，唯存陳垣、沈兼士等師長來函，總計不到十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友。此一現象，應非偶然，它顯示了臺靜農個人對於過往生命歷程的選擇性保存，也蘊藏著對於特定時期之情誼與記憶的念茲在茲。烽火連天的歲月裡，國事蜩螗，家計唯艱，友朋之間談學論藝，患難與共，誠然刻骨銘心。

其次，檢視其中的手稿資料，我們發現：使用「國立編譯館稿紙」或「國立編譯館用箋」書寫抄錄者，多達數千頁，幾乎佔了全數文稿分量的半數以上。其中，《亡明講史》與《中國文學史》「唐代」以前的諸多初稿，以及白沙時期的詩稿《白沙草》，固然用的都是國立編譯館稿紙，其它包括「兩漢奴婢史料／論文稿」、宋代「文網錄」在內的多種文獻資料，也都以編譯館的稿紙進行撮錄，再各以資料袋妥為收置。

凡此，都透露出：「國立編譯館時期」的生活與學思經歷，對於臺靜農而言，實屬意義非凡。尤其，當初舉家渡海來臺，「因沒有商輪，惟搭軍船，行李不能過多」，[7]臺靜農仍然隨身攜帶了為數可觀的文稿、書信及研究資料，它們之於臺的重要性，自是可以想見。再就其畢生著述看來，早年的臺靜農戮力於新詩、小說等新文藝創作，白沙期間，開始寫作舊體詩與雜文。來臺之後，新詩、小說完全停筆，反倒是雜文與舊體詩仍然書之不輟，並以此標識出特殊的個人風格。此外，他在入川前的發表以文學創作為主，研究論述為數有限，行文也並不刻意詳徵文獻史料。[8]入川之後，非但研究論文開始側重於文獻史料考述，所撰寫的許多短文，也多有植基於史料的趨向。諸如〈士大夫好為人奴〉、[9]〈關

7 見臺靜農，〈記「文物維護會」與「圓臺印社」——兼懷莊慕陵先生二三事〉，《龍坡雜文》（臺北：洪範書店，1988），頁 114。

8 就現今所見考察，臺靜農最早的論文應是作於 1924 年的〈宋初詞人〉，收入陳子善、秦賢次編，《靜農佚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頁 172-192。此後是〈中國文學起原之研究〉，載於《平等》第 1 卷第 1 期（1931 年 3 月），頁 1-5。此外另有〈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一篇，刊載於《歌謠》第 2 卷第 16 期（1936 年 9 月），頁 1-4。入川後有三篇，分別為：〈關於《西遊記》江流僧本事〉，《文史雜誌》第 1 卷第 6 期（1941 年 6 月），頁 51-53；〈南宋小報〉，《東方雜誌》第 39 卷第 14 號（1943 年 9 月），頁 39-40；〈南宋人體犧牲祭〉，《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學術集刊》第 1 期（1945 年 8 月），頁 51-58。另有〈兩漢書簡史徵〉一文，應於 1940-42 年之間即已寫就，卻遲未發表，直至 1989 年始收入臺靜農，《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 57-80。

9 臺靜農，〈士大夫好為人奴〉，《星島日報・星座》第 355 期（1939 年 7 月 29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販賣生口〉、[10]〈關於買賣婦女〉、[11]〈跋後漢兩碑文〉[12]等，它們的共同特色是：全文以徵引考述史料文獻為主，近乎學術性的論述。惟因篇幅較短，文中又不時援古證今，雜入個人關乎當下政治現況與社會風氣的感慨，因此形成一種在「學術文」與「雜文」之間逡巡游移的文體。此一行文方式，實為入川之前所未見。而它不僅在同一時期的《亡明講史》與《中國文學史》若干章節中也依稀可見，甚至延續至來臺之後的雜文寫作（詳後）。據此，或可簡而言之，從白沙時期開始，臺靜農的創作與研究便開始逐漸轉向：創作方面，小說、雜文與古典詩並行；研究方面，開展出側重於史料文獻考述的走向，甚至於，史料文獻還大量滲入他的雜文書寫，形塑出特殊的現代文學書寫風貌。白沙九年，因此成為臺靜農個人創作與研究的轉折期，上承入川之前，下啟來臺之後。

那麼，接下來要問的是，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樣的轉變？它的意義為何？尤其，臺靜農的遺稿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寫在「國立編譯館稿紙」之上，而所謂的「白沙九年」，又因為臺靜農任職單位不同，可再細分為「國立編譯館時期」與「女子師院時期」。在國立編譯館時期尚未得到學界充分梳理之際，我們是否可經由他在「國立編譯館時期」的閱讀與書寫去探究前述問題？在此，遺稿中所抄錄的各類文獻資料、所留存的學術論文剪報，及雜置於資料袋中的許多編譯館圖書室的借書單，遂值得特別留意——儘管它們很可能只是臺靜農當年閱讀材料中的一部分，卻揭示出他當時的學思關懷，藉此，或許可以管窺他在編譯館期間的閱讀視野，從而蠡測此一期間所思所學的變與不變。

三、抗戰時期的國立編譯館與臺靜農的「史料轉向」

1938 年秋，「始經喪亂」的臺靜農舉家到達四川，雖經友人協助，暫居於江津縣白沙鎮富紳鄧燮康（1907-1978）的莊園，然而顛沛流離之後，如何維持生計，實為燃眉之急。事實上，當時與臺靜農境況相同的高教人員為數極其眾多，國府教育部於是在 1938 年 4 月 18 日頒佈〈教育部登記戰區專科以上學校

10 臺靜農，〈關於販賣生口〉，《新蜀報・蜀道》第 131 期（1940 年 5 月 28 日），署名孔嘉。

11 臺靜農，〈關於買賣婦女〉，《新蜀報・蜀道》第 132 期（1940 年 5 月 29 日），署名孔嘉。

12 臺靜農，〈跋後漢兩碑文〉，《新蜀報・蜀道》第 267 期（1940 年 10 月 28 日），署名孔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員分發服務及待遇辦法〉，讓登記合格的學校教員，依其專長及志願分發工作，包括：

（一）國立編譯館臨時編譯；
（二）師範講習所教師；
（三）地方教育臨時輔導員；
（四）鄉土教材研究員；
（五）青年及民眾讀物臨時編輯員；
（六）其他相當工作。

至於待遇，則據資歷從每月五十元到一百二十元不等。[13]因此，臺靜農於入川途中，便向教育部寫信請求登記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入川之後，隨即被分派擔任教育部青年讀物臨時編輯，並短暫擔任大學先修班教員。[14]雖仍入不敷出，猶自勉力維持。1939 年 4 月，國立編譯館為逃空難，由重慶遷到白沙，臺靜農遂爭取成為編譯館編輯，自該年 7 月起任職，直到 1942 年 10 月辭職轉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為止，總計約三年多的時間。[15]

三年時間並不算長，但對於臺靜農日後治學為文，卻是影響極大。所以如此，當與國立編譯館的工作性質，及其圖書室所藏圖書在戰時所發揮的功用有關。「國立編譯館」職司國家教科書之編譯，兼具教育機構與翻譯機構的職能。其前身，可追溯至 1862 年清廷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下的京師同文館。1902 年，京師大學堂合併京師同文館，隨即在官書局原址改設編譯書局，成為最早由官方設置的新式教科書編譯機構。民國成立之後，教科書採審定制，教育部於是在總務廳下設編審處，負責編審教科書。1925 年 8 月 14 日，北京政府教

13 參見〈教育部登記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分發服務及待遇辦法〉，《教育通訊》1938 年第 9 期（1938 年 5 月 21 日），頁 12。

14 參見黃立斌，〈臺靜農在「國立編譯館」〉，頁 54-63。

15 根據所留藏之聘書，臺靜農應是自 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6 月受聘為編譯館之特約編輯；1940 年 4 月並為編譯委員會委員。1940 年 7 月開始任職專任編譯，1942 年 1 月起為編審，並續聘至 1943 年 6 月。然臺於 1942 年 10 月即辭去編譯館職務，11 月起轉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參見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374～0379、ntul_mf0003_0374～03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育總長章士釗（1881-1973）倡議設立「國立編譯館」以掌理編纂翻譯圖書，[16]雖因時局動盪，不了了之，但終因其於教育方面的需要，經國民政府多方研議之後，於 1932 年在教育部編審處的基礎上正式成立。

國立編譯館成立之初，館址設於南京，後因抗戰軍興，奉命遷移，歷經廬山、長沙，1938 年 2 月遷至四川重慶，同年 6 月遷往巴縣；1939 年 4 月，再遷至江津白沙鎮。1942 年 3 月，該館合併了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與中國教育全書編纂處，又從白沙遷往北碚，直至 1946 年 5 月才遷返南京。[17]

由於職司「掌理關於各種學校之圖書編譯事務」，[18]館中人員必須廣參各類文獻圖書，編譯館因此擁有頗具規模的圖書室，即使在抗戰入川期間，仍有中文書五萬餘冊，西文書四千餘冊。[19]這些書籍的來源有三：其一為自南京攜出之必需用書；其二為得自於安徽大學移交保管的書籍；三為到渝之後新購的圖書。[20]戰爭時期，一切物資都極其匱乏，不少學術機構的藏書都毀於戰火之中，編譯館所收藏的圖書資源尤其彌足珍貴，它也以此成為川中各機關人員、各方研究者頻頻前往借閱圖書的中心。[21]為此，該館遂明訂若干館外借書規則，首先敘明：「本館圖書係為本館編譯人員而設，室內圖書專供編譯人員長期參考之用，除非應特別之需要，概不借出館外」。其它規定還包括：

・凡來館借書者，必需持有所服務機關或學校之正式借書文件，先

16 章士釗，〈創辦國立編譯館呈文〉，《甲寅》第 1 卷第 5 號（1925 年 8 月），頁 1-2。

17 參見胡喜云，〈從「總領譯事」到掌理學校書圖編譯——國立編譯館研究〉，《安徽史學》2020 年第 4 期，頁 102-110；胡喜云，〈國立編譯館在北碚〉，《書屋・人物春秋》2019 年第 12 期，頁 25-29。

18 參見〈國立編譯館組織規程〉，《國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公報》第 4 期（1940 年 6 月），頁 15。

19 舒紀維，〈國立編譯館圖書室的工作〉，《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 16 卷第 5、6 期合刊（1942 年 6 月），頁 8。

20 參見〈國立編譯館圖書館近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 14 卷第 1 期（1939 年 7 月），頁 19。

21 如老舍之子舒乙（1935-2021）即曾回憶：抗戰期間，愛書的老舍（1899-1966）因逃難而丟失、變賣了身邊所有的藏書，「四大皆空」，入川之後，雖然當時北碚也有一座很不錯的市立圖書館，但是老舍從來沒有從那裡借閱過任何書籍，反倒「都是托朋友替他在編譯館圖書室解決借閱，如果有什麼書籍要參考的話。」參見舒乙，〈老舍四大皆空的日子〉，《國學》2013 年第 1 期，頁 32-33。另如陳獨秀，在川期間編寫《小學識字教本》，也不斷委託臺靜農代為向編譯館借閱書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向館中商洽，再行查借；

- 每人每次借閱中西文書籍，暫以一部為限、中文線裝書每部冊數過多者另議；
- 借期以兩星期為限。[22]

凡此，皆可見較諸該館之編譯人員，實有諸多不便。在此情況下，對於流離在川，需要不斷參考使用大量書籍的研究者而言，成為編譯館的編譯人員，應屬極佳選擇。臺靜農入川後任職於編譯館，自然得以有圖書使用之便。當時他在編譯館所負責的工作與他日後為學與為文之間的關係，自當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根據 1947 年發佈的〈國立編譯館十四年來工作概況〉，該館自 1932 年成立以來，館內工作主要分為「教育用書之編審」與「專門譯著之編審」兩大部分。前者在於編輯審訂國內各級學校之教科書、民眾讀物，以及各類辭書辭典手冊年鑑；後者則包括「中國文獻之整理」、「學術名詞之釐訂」、「西洋名著之繙譯」、「中國文化之介紹」、「專門譯著之審查」五大項目。其中，「中國文獻之整理」一項，涵括「整理史料」、「整理經典」、「編纂志書」、「纂輯總集」、「編製中國歷史地圖」、「整理邊事材料」六個分項。[23]而當年臺靜農主要負責的工作，即是「整理史料」。

「整理史料」的工作又可細分為專史史料（包括經濟史料、社會史料及政治制度史料）、民族運動史料、斷代史料三部分。[24]參照臺靜農所留存的手稿，他所整理的史料，實以「社會史料」為大宗。前文曾提及的「兩漢三國社會史料」，即屬此一時期的工作成果。當然，這些資料之於臺靜農，應該不僅止於整理抄錄而已，它們將很自然地進入他的閱讀視野，並且融入此後論學為文的字裡行間，成為其中的重要基幹。他的學術文與雜文寫作之所以在此一時期開始產生明顯的「史料轉向」——也就是不僅看重史料，為文多取材史料，更以一己之情感思想與之對話——自當由此著眼。

另一方面，由於當時臺家已移居黑石山，僻處鄉間，離白沙約八、九里，臺任職編譯館，兩地間交通不便，據其長子臺益堅回憶：當時「父親經常不在

22 參見〈國立編譯館圖書館近訊〉，頁 19。

23 參見〈國立編譯館十四年來工作概況〉，《科學》第 29 卷第 5 期（1947 年 5 月），頁 153。

24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一兩週才返家一次」。[25]可知編譯館三年，臺靜農泰半時間都獨居於編譯館的宿舍之中，潛心讀書寫作。厚積而薄發，所積累的成果，遂漸次體現於日後的各類撰述之中。

四、臺靜農「編譯館時期」的閱讀視野：手稿、論文剪存與「借書單」

臺靜農的「編譯館時期」既得以坐擁圖書資源，又暫時免於家小煩擾，那麼，這段時光之中，他究竟寓目了哪些文獻圖書？我們將如何據以蠡測它們與臺靜農當時，以及日後為學與為文的關係？在此，臺所遺留的手稿、學術論文剪存資料，以及夾雜於其間的「國立編譯館借書單」，適可作為管窺的依據。

（一）手稿資料：從文學史到社會史

如前所述，臺靜農所遺留的手稿資料中，以「國立編譯館稿紙」繕寫者，佔有極高比例，它們多數分門別類，被放置在不同的資料袋中。資料以自己的親抄本為主，亦間有部分係由他人代為抄寫謄錄。除卻已出版成書之《中國文學史》、《亡明講史》與等屬於個人撰述的文稿外，就品類看來，以文學性的札記、隨筆居多。如：「楚辭隨筆」、「楚辭札記」、「文心雕龍體類」、「漢魏南北朝別集解題」、「唐五代別集解題」、「畏廬韓柳文研究節錄」、「唐代文學札記」、「宋詩人札記」、「荊公詩註資料」、「太平御覽待用稿」，[26]以及「兩漢樂舞考史料、文稿」[27]等多種。這些資料，大抵與文學史研究與教學相關。此外，另有工具性的參考資料，諸如：「人名類工具書」、「年代書」等。至於「發現漢木簡」、「印章溯源」、「古俗金石文字最錄」、「談木簡書」[28]等，則是關乎古代簡書、金石文字研究的材料。

25 臺益堅，〈燔火——追悼先父臺靜農〉，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103。

26 分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特藏資料(以下稱「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ntul_mf0003_0106、ntul_mf0003_0107、ntul_mf0003_0036、ntul_mf0003_0032、ntul_mf0003_0047、ntul_mf0003_0048、ntul_mf0003_0050、ntul_mf0003_0057、ntul_mf0003_0059、ntul_mf0003_0065。

27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8。按：此一資料袋以樂舞史料為主，另有目錄兩頁，借書單兩張。

28 分見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204、ntul_mf0003_0205、ntul_mf0003_0020、ntul_mf0003_0201、ntul_mf0003_0202、ntul_mf0003_02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綜觀所有的手稿資料，其中抄錄分量最為豐贍浩繁的，乃是與編譯館工作直接相關的「社會史料」，主要包括「兩漢奴婢史料／論文稿」與「文網錄」。它們不僅所蒐羅的資料條目繁多，被分置於幾個不同資料袋，呈現出一定的「系列」特性，而且也都有幾近成型的論述。如「兩漢奴婢史料／論文稿」，這批手稿就可分為「漢奴婢史料原稿」與「漢奴婢制度史徵」兩部分，前者為相關文獻之抄錄，後者則章節綱目畢具，如：「第一章　官私奴婢之社會地位」；「第二章　官奴婢」；「第三章　私奴婢」；「第四章　豪門奴婢之坐食生活及其恣肆行為」；「第五章　奴婢之社會問題」；「第六章　奴婢之獲放免」；「第七章　王莽與奴婢問題」。各章節中並且分別條列出若干擬引錄之文獻資料，已經是幾近於完稿的論文。[29]它們幾經修改謄錄，以不同的版本形式分置在「兩漢三國社會史料奴婢篇」、「兩漢社會史料：奴婢篇」幾個不同的資料袋中。[30]

其次是「文網錄資料」，它又細分為「文網」、「詩禁」、「詩文禁」、「道學禁」、「書禁」、「史禁」、「中興聖政」、「李光私史案（紹興二十年）」、「車蓋亭詩案」[31]等。加上題名為「野史禁：司馬溫公紀聞（紹興十五年）」[32]與「宋代社會史料拾零」[33]兩袋資料，以及所藏之線裝書《慶元黨禁》[34]與來臺後的「慶元黨禁史證筆記本」，[35]顯示出臺靜農對於宋代各式文網、史禁及黨禁問題多所關注。其所錄資料來源兼括多種史籍與筆記雜談，內容繁富，僅需再予以融裁抒論，即可成篇。

此外，與「敦煌」相關的資料及文稿同樣為數甚夥，或許是另一可資注意者。相較於漢代社會史料與宋代文網資料的鉅細靡遺，這一系列主要見諸「敦煌石室講唱文目」、「敦煌石室的講唱文」、「敦煌俗講文目錄」及「敦煌石室遺書」。[36]總體份量雖少於前述的漢代奴婢與宋代文網，但它的特殊處在於，臺靜農不但親自一再抄之錄之，還為所錄之資料題寫小記。如「敦煌俗講文目

29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3。

30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2～0136。

31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76～084。

32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066。

33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84。

34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409。該書為知不足齋叢書本，封面並有附註：癸未六月 簡人；書中有多處毛筆與紅筆眉批註記。

35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476。該資料係以臺灣大學筆記本抄錄。

36 分見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55、ntul_mf0003_0153、ntul_mf0003_0154、ntul_mf0003_14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錄」使用的是「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原稿用紙」，抄錄時間為來臺初期，其封面即以毛筆楷書撰寫題名，並以小字註記：

>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十一時三十八分時寓臺北／龍坡里寄庵／難靜。

臺為何「難靜」？「難靜」與抄錄敦煌資料一事之間是否有所關聯？箇中曲折，或可在另一資料袋「敦煌石室遺書」中略窺端倪。據所使用的稿紙形制，該袋資料抄錄時間應更晚於前述資料，[37]內容包括敦煌石室遺書、敦煌掇瑣、敦煌劫餘錄。其中「敦煌掇瑣」與「敦煌劫餘錄」都標明二者皆係抄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並且分別注明：

> （敦煌掇瑣）編輯者劉半農先生復。……先生自序云：「以上文件一百零四種，都是從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中錄出，略照性質分類。關於民間文學的，歸入上集；關於社會情事的，歸入中集；關於語言文字的，歸入下集。換句話說：上集是文學史的材料，中集是社會史的材料，下集是語言史的材料。」

> （敦煌劫餘錄）編輯者陳援庵先生垣。先生民國十一年兼長京師圖書館時，日閱館中所藏敦煌經卷百軸，幾三越月閱畢，編為十四帙，著錄經卷八千六百七十九號。先生序云：「其中遺文異義，足資考證者甚多；即卷頭紙背所書之日常帳目，交易契約，鄙俚歌詞之屬，在昔視為無足重輕，在今矜為有關掌故者亦不少；特因未刊布外間，無由窺其蘊耳。」是錄編成，至民國十九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始為之付印。[38]

37 臺靜農所使用的稿紙，其形製、品牌與所屬單位主要有松雅齋、國立編譯館稿紙、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原稿用紙、一曲書屋、臺灣大學稿紙、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金山牌、孔雀牌幾大類，亦間有稿紙上未印有品牌及單位名者。其中，松雅齋稿紙用於任教於山東大學期間，國立編譯館稿紙用於白沙期間，其餘皆為來臺之後才開始使用。至於未標品牌與單位者，則依其印製之精緻程度，大略判別其使用之年代。「敦煌石室遺書」的稿紙未見品牌與單位名，但形製已相當精緻，與 1970 年代臺灣的稿紙相類，因此抄錄時間可判定為來臺多年之後。

38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4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據此，臺靜農之所以關注敦煌資料，一方面因為它同時融涉文學史、社會史與語言史，三者都是他極為關注的議題。另一方面，亦與當年在京時的師長劉復（1891-1934）、陳垣（1880-1971）有關。1950 年歲末，他寓於「寄庵」，夜半「難靜」，或許正是回首前塵，感慨系之？

（二）學術雜誌論文剪存與「借書單」：融通古今，兼括中外的閱讀取向

臺靜農於報章雜誌所刊載的學術論文向來多所留意。臺大的特藏資料中，有一批「學術雜誌論文剪存」，其中不少都是剪存於白沙時期。它們多數來自於 1940 年代創刊於大後方的學術雜誌。包括：《志林》（1940 年 1 月創刊，國立東北大學編輯）、《責善》半月刊（1940 年 3 月創刊於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編輯）、《文史雜誌》（1941 年 1 月創刊於重慶，6 月起由顧頡剛（1893-1980）編輯）、《國力》月刊（1941 年 1 月創刊於湖南藍田）、《史地教育特刊》（1941 年 10 月創刊於湖南長沙，由國立師範學院史地學會編輯出版）、《中原》月刊（1943 年 6 月創刊於重慶，郭沫若（1892-1978）主編）等。刊行有年者，唯商務印書館編印之《東方雜誌》一種。

據出刊日期，這批論文應是分別被剪存於編譯館時期及女師院時期。女師院時期所剪存資料的論述主題相對分散，[39]編譯館時期所關注的論題，則較為集中，主要有二，其一為文化史與社會制度史相關者。包括：唐蘭〈論騎術入中國始於周末〉；[40]李源澄〈論元魏之大家庭〉；[41]楊向奎〈論中古時代之譜牒與刑〉；[42]魏洪禎〈唐代門閥及其衰落之原因〉。[43]其二則為苗傜民族的歌謠、

39 它們包括《中原》月刊中，蔡儀、太戈爾（Robīndronāth Ṭhākur）關於「藝術」問題的討論；《東方雜誌》裡陳安仁〈漢代對西域交通與中西文化之影響〉、唐文播〈巴黎所藏敦煌寫本老子二四一七卷考證〉等文章。參見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46、1348、1365。

40 唐蘭，〈論騎術入中國始於周末〉，《文史雜誌》第 1 卷第 3 期（1941 年 5 月），頁 17-20。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66。

41 李源澄，〈論元魏之大家庭〉，《文史雜誌》第 1 卷第 11 期（1942 年 5 月），頁 17-23。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50。

42 楊向奎，〈論中古時代之譜牒與刑〉，《文史雜誌》第 1 卷第 11 期（1941 年 5 月），頁 13-16。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49。

43 魏洪禎，〈唐代門閥及其衰落之原因〉，《責善》第 1 卷第 21 期（1941 年 1 月），頁 13-16。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信仰與民間傳說。諸如：羅榮宗〈水西苗胞歌謠的研究〉；[44]岑家梧〈槃瓠傳說與傜畲的圖騰崇拜〉；[45]張政烺〈玉皇姓張考〉。[46]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羅榮宗的另一篇文章〈古史今證：史實研究之商榷〉[47]——該文雖是討論史實研究問題，但它以為「研究古史，乃不必盡憑臆想中之摸索」，而可以就「地下遺物」、「文化遺物」與「現存原始民族風俗」三種材料去進行考索，對臺靜農而言，顯然是心有戚戚焉。參照臺對於早期文學的研究，大抵也是由此入手。尤其是「現存原始民族風俗」，更是他多年來治學所關注焦點之一。

此外，臺靜農編譯館期間的工作固然是整理古籍史料，然而他的閱讀，完全不限於傳統的史料文獻與古典文史研究。在此，手稿資料中所留存的一批編譯館圖書室的「借書單」，[48]遂特別值得留意。這批借書單大多被夾置於「兩漢奴婢史料／論文稿」資料袋中，[49]雖然有些已被撕裂，殘缺不全；多數借閱的書名、日期仍可辨識（請見文末圖 1）。

這些借書單所呈現的，或許只是當年他所借閱書籍的一部分，不過仍可看出：他的閱讀以古籍居多，但新出版的圖書，其實不在少數。而也正是這些當代圖書，揭示出臺靜農在古典傳統之外的當代視野。

臺靜農借閱的古籍大致涵蓋四部中的經、史、集三部，且有不少筆記舊聞之屬。經部如《皇清經解》、《急就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50]史部如《三輔黃圖》、《罪惟錄》、《舊聞證誤》、《甲申朝事小記》；[51]集部有《全

44 羅榮宗，〈水西苗胞歌謠的研究〉，《國力》第 2 卷第 9、10 期合刊（1942 年 10 月），頁 11-13。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59。

45 岑家梧，〈槃瓠傳說與傜畲的圖騰崇拜〉（未完），《責善》第 2 卷第 7 期（1941 年 6 月），頁 2-8。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70。

46 張政烺，〈玉皇姓張考〉，《責善》第 1 卷第 8 期（1940 年 6 月），頁 6-12。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64。

47 羅榮宗，〈古史今證：史實研究之商榷〉，《史地教育特刊》創刊號（1942 年 10 月），頁 1-5。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1374。

48 據國立編譯館圖書室借閱辦法，借書人借書，須先查明圖書室圖書目錄卡片上之圖書編號，填交圖書管理員檢取，再於「借書單」上簽字，以為憑證。見〈國立編譯館圖書館近訊〉，頁 19。

49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2。亦有少數置於「兩漢樂舞考資料、文稿」袋中。

50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2-012、ntul_mf0003_0132-363、ntul_mf0003_0132-150。

51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2-181、ntul_mf0003_0132-059、ntul_mf0003_0132-114、ntul_mf0003_0132-1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柳河東集》、《十八家詩鈔》、《定盦文集》[52]等。新書則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1. 國內學者的研究撰述：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黃現璠《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酈承詮《說文解字敘講疏》。[53]
2. 國內學者編纂之作：胡君復編《當代八家文鈔》、周天籟編纂《作文辨字典》。[54]
3. 翻譯論著：《屠格涅夫》（André Maurois 著，吳且岡譯）、《拿破侖論》（Élie Faure 著， 桑諧譯）、《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研究》（Fustel de Coulanges 著，李玄伯譯）、《古代斯拉夫文化》（Louis Leger 著，萬良炯譯）、《西域文明史概論》（羽田亨著；鄭元芳譯）、《南洋獵頭民族考察記》（A. C. Haddon 著，呂一舟譯）、《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B. Malinowski 著，李安宅譯）。[55]
4. 翻譯小說：《沙寧》（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 著，鄭振鐸譯）、《間諜》（Hans Rudolf Berndorff 著，陶茲人譯）、《挪威短篇小說集》（古有成選譯）。[56]

這批書籍頗多翻譯著作，所透露的，應是臺靜農在從事傳統文學與文獻史料研究時，所意圖開展的不同面向，以及個人的文學興趣和社會關懷。將它與手稿及剪存的學術論文比合而觀，正可看出，他的閱讀是如何在「古典」與「現代」之間依違往復，兼容博納。

52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2-356、ntul_mf0003_0132-291、ntul_mf0003_0132-263、ntul_mf0003_0132-385 與 ntul_mf0003_0132-432。

53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2-243、ntul_mf0003_0132-231、ntul_mf0003_0132-346、ntul_mf0003_0132-234、ntul_mf0003_0132-378。

54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2-322、ntul_mf0003_0132-188。

55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2-353、ntul_mf0003_0132-259、ntul_mf0003_0132-334 與 ntul_mf0003_0132-337、ntul_mf0003_0132-246 與 ntul_mf0003_0132-254、ntul_mf0003_0132-390 與 ntul_mf0003_0132-393、ntul_mf0003_0132-331、ntul_mf0003_0132-411。

56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132-406、ntul_mf0003_0132-435、ntul_mf0003_0138-0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出入於「古典」與「現代」之間的閱讀視野

臺靜農於任職國立編譯館期間所閱讀的書籍資料品類繁多，兼括古今，然而仔細尋繹，實可看出其於「古典」與「現代」之間的融通勾連。其間要旨，至少可由以下三方面略見端倪：

其一：不同學科之研究視角的參照借鑒

這批借閱圖書中的《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與《南洋獵頭民族考察記》，都是現代（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它們著重經由實際的田野工作，就原始民族的風俗，宗教，語言及生活狀況進行具體考察與思辨，提供了傳統紙本文獻之外的另一觀照視野。臺靜農 1920 年代在北大參與歌謠研究會與民俗研究會，並為此赴淮南採集民歌，原就曾深入民間，對於早期的庶民生活與文化形塑深有興趣。他在 1931 年發表〈中國文學起原之研究〉，即是由原始人類之歌唱著眼，論析早期文學與先民生活的關係。剪存有關苗傜民族之歌謠、信仰與民間傳說的論文，以及羅榮宗看重「地下遺物」、「文化遺物」與「現存原始民族風俗」的史實研究方法論，都與此研究視角一氣相通。參照他日後的研究，實可看出其間所隱含的文化人類學視角。他在編譯館時期所撰寫，後來於《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學集刊》發表的〈南宋人體犧牲祭〉，正可視為該研究視角的具體實踐。

其二：中外相參的社會文化史研究

臺靜農在編譯館時期的主要工作是整理中國古代社會史料，制度史與文化史尤其是重點。他所剪存的唐蘭（1901-1979）、楊向奎（1910-2000）、魏洪禎（?-?）等人的論文，即是這方面的研究。但他顯然並不自限於此，對於域外的古代社會文化史，也意圖多所涉獵，以為研究之參考。他所借閱的《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研究》、《古代斯拉夫文化》、《西域文明史概論》，都是國際學界有關域外社會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其中，《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原書名為 *La Cité antique*（《古代城市》），該書以「宗教」為經線，論析古希臘、羅馬社會發展的各階段及相關制度，尤其對各制度產生的社會、信仰基礎作了客觀的敘述和分析，提出不宜以古律今，更無須復古之說，對當時的史學研究頗有衝擊。譯者李玄伯（1895-1974）與臺靜農在北大就讀時期都曾受教於陳垣，兩人素為好友。後來李也渡海來臺，任教於臺大歷史系，與臺同事多年。李玄伯治史深受此書啟發，代表作《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從比較觀點論析中國的古代社會，即是以此為基礎而予以開展。[57]臺靜農對於李的研究方法及

57 李玄伯曾為此書撰寫長篇譯者導言，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新研——歷史的剖面〉一文。後來他將該文與他的另一篇論文〈中國古代圖騰制度與政權逐漸集中〉合為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點，顯然深為認同。李玄伯逝世之後，臺為文紀念，評述此書及李研治古史之成就，便表示：

> 站在人類進化史的觀點探討某一民族的原始生活與發展，這是科學的精神，也是現代學者應有的態度。[58]

從參較中外，到以「進化史觀點」就中國自身的文史論題進行探析，不唯是李玄伯研究中國古史的方法，臺靜農的研治中國文學的理念與實踐，同樣循此開展。

其三：古今參照中的文學興趣與社會關懷

除卻研究視角與方法之外，從這批編譯館時期所借閱的圖書，應該也可以看出臺靜農個人的文學興趣與社會關懷。尤其是翻譯小說，其中《沙寧》一書作者阿爾志跋綏夫（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1878-1927）是蘇聯新興文學典型的代表作家，作品每每以寫實手法，刻畫當時知識分子的孤獨、失落、沮喪與墮落。他的作品經由魯迅的翻譯和推廣而受到中國文學界高度關注，《沙寧》正是重要代表作。1930 年前後，中國至少出版了由鄭振鐸（1898-1958）、潘訓、邱濤聲和周作民翻譯的幾個不同譯本，風行情況，由此可見。[59]《間諜》為 Hans Rudolf Berndorff（1895-1963）所撰寫的諜報之作，收有〈戰前的間諜〉、〈一名最偉大的德國女間諜〉等共十四篇作品。[60]《挪威短篇小說集》為譯者古有成根據紐約 Norton and Company Inc.出版的 *Norway's Best Short Stories* 選譯而成，[61]所選錄的小說，不少作者都出身於農家，作品多能體現當時庶民生活的

書，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新研》，1941 年由北平來薰閣書局出版。

58 臺靜農，〈李玄伯先生的古史研究〉，《龍坡雜文》，頁 156。

59 這些譯本中，鄭振鐸的譯本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於 1930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後多次再版，影響最大。潘訓譯本同於 1930 年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邱濤聲譯本於 1934 年由上海中學生出版社出版；周作民譯本於 1936 年由上海啟明書局出版。

60 該書作者 Hans Rudolf Berndorff 民國時期曾有兩個翻譯名字：「伯爾恩道」與「彭道甫」。現多翻譯為：「漢斯・魯道夫・伯恩多夫」。《間諜》一書由陶茲人翻譯，初版於 1934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後 1937 年與 1938 年重慶商務與長沙商務都曾先後出版過這本書。按：《沙寧》、《間諜》之譯作資料，係由西南大學中文系湯晶老師協助查詢，特此致謝。

61 見古有成，〈引言〉，古有成選譯，《挪威短篇小說集》（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頁 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麟爪，間有對官吏與上層階級的批判。臺靜農早先小說創作的關懷面向、他的政治傾向，以及與魯迅的關係，似乎也可以經由這些譯作而得到某種程度的參證。

此外，《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於 1936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作者黃現璠（1899-1982）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曾師事陳垣。他有感於中國時局內憂外患，北平大學生卻大多對國事無動於衷，遂撰寫〈宋代太學生之政治運動〉一文；翌年，復就此文修改、補充，完成《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一書。全書經由言之有據的客觀考證，論述宋代太學生對外對內一系列救國活動的起因及過程，被學術界公認為 20 世紀中國學運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學專著，同時寄託了當代學院知識分子藉古史而抒今懷的心事。它與臺當時蒐錄宋代文網資料一事似乎沒有太多關聯，然而此一寄託方式，卻正是臺靜農白沙時期諸多雜文寫作的底蘊。箇中曲折，或可經由「白沙讀史箚記」系列雜文以見一斑。

五、「白沙讀史箚記」：「史料轉向」與雜文書寫

（一）手稿資料中的「白沙讀史箚記」

臺靜農早年以小說創作見重於文壇，間有新詩、劇本之作。至於「雜文」，一般人多以為撰寫於來臺之後，並以結集成書的《龍坡雜文》為代表。但事實上，臺的雜文寫作開始甚早，抗戰期間為數尤夥。它們多從史料文獻出發，抒發對現今時局的感懷或批判。雖然這批文章在他生前未曾結集出版，[62]但從臺大館藏資料看來，它們不僅深受臺靜農重視，而且很可能原本臺就有意將它以「白沙讀史箚記」之名付梓。原因是：臺大館藏資料中有兩個資料袋，分別名為「〔白沙讀史箚記〕文章剪報」與「白沙讀史箚記」。前者計有十二篇文章剪報，包括：1.〈士大夫好為人奴〉；2.〈談薙髮〉；3.〈歷史之重演〉；4.〈秀才〉；5.〈關於買賣婦女〉；6.〈關於販賣生口〉；7.〈跋後漢兩碑文〉；8.〈瞻烏爰止於誰之屋〉；9.〈讀「日知錄校記」〉；10.〈紀錢牧齋遺事〉；11.〈談倭寇底直系子孫〉；12.〈舉一個例〉。後者則收有他人代為重新繕錄的文稿，從〈士大夫好為人奴〉到〈紀錢牧齋遺事〉，共十篇（缺〈談倭寇底直系子孫〉與〈舉一個例〉），同時附有臺親自撰寫封面題名，以及包含這十

62 這批雜文首先被收入於陳子善與秦賢次兩位先生合編的《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2018 年，編者將它修訂增補，以《靜農佚文集》之名，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重新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篇文章的目錄一份。（參見文末圖 2）

其次，「〔白沙讀史箚記〕文章剪報」所收剪報，每篇都貼附在白紙上，由臺親筆就所刊出的報刊文字進行校訂；而「白沙讀史箚記」的繕錄稿上，臺還會再就已繕錄完成的若干文句進行細部修訂。如此審慎以對，應該就是為日後公開出版而預作準備。（文稿之編排、校訂、繕錄及修改情形，請參見文末圖 3）

這批資料所顯示的訊息提醒我們：以「白沙讀史」為名的「箚記」，對於臺靜農個人的重要性。其間機栝，恰恰可以從臺自題書名的三個關鍵詞而一窺究竟：書寫的時間與地點：「白沙」；書寫的緣起：「讀史」；作為新文學寫作類型之一種的「箚記」。

檢索現今可見之資料，臺靜農於川中時期所發表的論文及小說雜文等各類篇什總計有三十二篇，其中編號 12 至 27，即屬於任職編譯館期間（1939 年 9 月至 1942 年 10 月）內所發表者，總計十六篇，見下表：[63]

臺靜農川中時期發表篇什簡表（1938・秋～1946・夏）

編號	發表／寫作日期	篇名（文體性質）	發表刊物	是否收入「白沙讀史箚記」
1	1938/10/29	魯迅先生的一生——在重慶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的一個報告（演講稿）	重慶《抗戰文藝》周刊第 2 卷第 8 期，頁 125-127	否
2	1938/11/25	記張大千（雜文）	重慶《時事新報·青光》，4 版	否
3	1938/12/18	大時代的小故事（小說）	重慶《文摘戰時旬刊》第 39 期，頁 888-889，又刊於福建《改進》第 1 卷第 3 期，1939 年 5 月 1 日，頁 118-120	否

63 本表所列篇什以公開發表於報刊者為限，當時尚未公開刊行之《亡明講史》、〈跋自書魯迅詩卷贈方重禹〉及〈葉廣度詩集序〉等文不在此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發表／寫作日期	篇名（文體性質）	發表刊物	是否收入「白沙讀史劄記」
4	1939/1/21（寫於 1938/12/28）	談倭寇底直系子孫（雜文）	重慶《抗戰文藝》周刊第 3 卷第 5-6 期，頁 74	否
5	1939/1/28（寫於 1939/1/10）	國際的戰友（報告）	重慶《抗戰文藝》周刊第 3 卷第 7 期，頁 105-106	否
6	1939/2/5	被侵蝕者（小說）	重慶《全民抗戰》五日刊第 52 號，頁 712-714	否
7	1939/2/21	電報（小說）	重慶《文摘戰時旬刊》第 44-45 期，頁 1000-1003	否
8	1939/4/25（寫於 1939/2/13）	么武（小說）	重慶《抗戰文藝》半月刊第 4 卷第 2 期，頁 43-45	否
9	1939/6/16（寫於 1939/4/24）	舉一個例（雜文）	重慶《青年生活》第 8-9 期，頁 13	否
10	1939/7/28	談薙髮（雜文）	香港《星島日報·星座》第 354 期	是
11	1939/7/29	士大夫好為人奴（雜文）	香港《星島日報·星座》第 355 期，又刊於上海《現實》半月刊第 3 冊，1939 年 8 月 25 日，頁 212-213	是
12	1939/10/1（寫於 1939/8）	魯迅眼中的汪精衛（雜文）	重慶《中蘇文化》第 4 卷第 3 期，頁 55-57，署名聞超	否
13	1939/11/15	魯迅先生整理中國古文學之成績（論文）	重慶《理論與現實》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頁 103-115，署名孔嘉	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發表／寫作日期	篇名（文體性質）	發表刊物	是否收入「白沙讀史劄記」
14	1940/1/29（寫於1940/1/23）	填平恥辱的創傷（小說）	香港《星島日報‧星座》第 489 期	否
15	1940/3/11	歷史之重演（雜文）	重慶《新蜀報‧蜀道》第 68 期，署名聞超	是
16	1940/3/13	秀才（雜文）	重慶《新蜀報‧蜀道》第 70 期，署名釋耒	是
17	1940/5/24	出版老爺（劇本）	重慶《新蜀報‧蜀道》第 128 期，署名孔嘉	否
18	1940/5/28	關於販賣生口（雜文）	重慶《新蜀報‧蜀道》第 131 期，署名孔嘉	是
19	1940/5/29	關於買賣婦女（雜文）	重慶《新蜀報‧蜀道》第 132 期，署名孔嘉	是
20	1940/10（寫於1940/3/16）	紀錢牧齋遺事（雜文）	重慶《七月》月刊第 5 集第 4 期，頁 173-174，署名孔嘉	是
21	1940/10/28	跋後漢兩碑文（雜文）	重慶《新蜀報‧蜀道》第 267 期，署名孔嘉	是
22	1940/11	聚奎學校六十週年之感想（雜文）	《聚奎六十周年紀念刊》，頁 27-29，署名霍邱臺靜農	否
23	1940/11/22	瞻烏仰止，於誰之屋（雜文）	重慶《新蜀報‧蜀道》第 289 期，署名釋耒	是
24	1941/3/20	讀「日知錄校記」（雜文）	重慶《抗戰文藝》月刊第 7 卷第 2-3 期，頁 204-205，署名孔嘉	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發表／寫作日期	篇名（文體性質）	發表刊物	是否收入「白沙讀史劄記」
25	1941/6/16	關於《西遊記》江流僧本事（論文）	重慶《文史雜誌》第 1 卷第 6 期，頁 51-53	否
26	1942/4/5（寫於 1941 年秋）	讀知堂老人的「瓜豆集」（雜文）	重慶《文壇》半月刊第 2 期，署名孔嘉，頁 2	否
27	1942/6/15（寫於 1941/4/3）	「謝本師」周作人：老人的胡鬧（雜文）	重慶《抗戰文藝》半月刊第 7 卷第 6 期，頁 404-406，署名孔嘉	否
28	1943/9/30（寫於 1943/6）	南宋小報（論文）	重慶《東方雜誌》半月刊第 39 卷第 14 號，頁 39-40	否
29	1944/2/29	觀酈衡叔畫後識語（雜文）	《貴州日報》第 4 版	否
30	1944/9（寫於 944/4）	我與老舍與酒（散文）	重慶《抗戰文藝》月刊第 9 卷第 3-4 期，頁 11	否
31	1945/8	南宋人體犧牲祭（論文）	《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學術集刊》第 1 期	否
32	1946/10/18	錮黨史話（雜文）	上海《希望》月刊第 2 卷第 4 期，頁 277-279，署名釋耒	否

對照「白沙讀史劄記」目錄中的十篇文章，可以看出：〈士大夫好為人奴〉與〈談薙髮〉兩篇發表稍早，其它八篇的寫作與發表，完全落在臺靜農於編譯館任職期間。因此所謂「白沙」，更精確的指涉，就是指以「國立編譯館時期」為主的一段時期。這十六篇發表於「國立編譯館時期」的文稿，除卻論文二篇、小說與劇本各一篇之外，屬「雜文」者凡十二篇，臺只取其中八篇，顯然是要凸顯它所欲聚焦的「讀史」主題。[64]如前所述，臺在編譯館的工作主要就是整理

64 原先剪報資料夾中留存的〈談倭寇底直系子孫〉與〈舉一個例〉在後來所編目錄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料，並經由大量檢閱各類史籍文獻，促成治學與為文的「史料轉向」。這一系列「箚記」，皆屬因「讀史」而生發的感時之作，恰恰是以現代的白話文書寫，體現出「歷史」與「現時」、「文言」與「白話」，「古典傳統」與「現代社會」之間的往來對話，值得進一步梳理。

（二）從「讀史」到「箚記」:「白沙讀史箚記」的文史因緣與現實關懷

就文體特質著眼，「讀史箚記」的書寫，必然涵括了「（所讀之）史」與「（自作之）文」兩部分。「文」因「史」而作，「史」因「文」而被重新詮解。二者具有相互生發的對話關係。因此，書寫者選擇了何種史料，以及以什麼樣的視角與情懷去詮解史料，抒發己見，自應是閱讀「讀史箚記」的重點。1940 年代以前，現代文學中雖不乏讀書筆記之作，以「讀史箚記」為名的文集，卻還不曾出現。因此，討論「白沙讀史箚記」之前，不妨先略為爬梳臺靜農書寫此類篇什的文史因緣。

「白沙讀史箚記」凡十篇，檢視其所讀之「史」，大致集中於漢晉、南宋，以及明清之際。如此取向，自當與臺靜農入川之後的工作性質與具體實績有關。1938 年秋，臺靜農舉家入川，途中他向教育部寫信請求登記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寓居江津白沙之後，被分派擔任教育部青年讀物臨時編輯，並且著手撰寫青年讀物「民族英雄張蒼水」，後因「已搜及之材料較廣，擬改為《晚明講史》」，並於當年十一月中完成初稿。[65]為撰寫此一書稿，於明清之際的史料文獻多所蒐羅，廣為寓目，原是不在話下。編譯館專職期間，負責史料編纂，主題尤其集中於漢晉社會（奴婢）史料與南宋文網文禁事件。當時所積累的成果，一方面以手抄文獻形式，被珍藏於各類資料袋之中；另一方面，則是讀之而心有所感，遂轉化為「箚記」，藉由系列雜文書寫去體現。而他所以藉由「箚記」形式撰寫「讀史」感懷，除編纂史料之工作因素外，應還有來自乾嘉以來的「讀

被刪除，應是其內容與「讀史」較無直接關聯的緣故。另如〈士大夫好為人奴〉與〈談薙髮〉兩篇雖在正式入職編譯館之前即已發表，但因當時臺靜農已寓居白沙，且其內容確屬「讀史」之作，因此將它收入。又按，這十篇「箚記」過去始終未曾正式結集出版，2024 年 11 月，臺灣大學出版中心與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合作出版「臺大人文大師系列」，其中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一書，以「附編」方式，將它完整呈現。以下引文，將先註明最初的發表時間及刊物，同時亦加註該書頁碼，以利查找。

65 參見黃立斌，〈臺靜農在「國立編譯館」〉，頁 54-63。臺原擬為教育部撰寫「民族英雄張蒼水」，後來變更為「晚明講史」，最後定名為《亡明講史》，2020 年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箚記」、陳垣之「史學」與魯迅之「文學」幾方面的因緣。[66]

首先就「箚記」之「文體」淵源著眼。「箚記」，又稱筆記、札記、雜錄、漫錄、筆餘等，初起於魏晉，北宋開始盛行，此後綿延不輟。此一「稽古有得，隨時箚記」之舉，乃是古代績學之士讀書治學的普遍習慣；「久而類次成書」，[67]亦屬水到渠成。新文學發展過程中，此類篇什多被歸於「小品文」之中。周作人《自己的園地》、《夜讀抄》，以及《知堂書話》等文集，尤為箇中代表。只是，這些被歸於「小品文」中的讀書筆記，所讀之書無所不包，並不以「史」為限。「白沙讀史箚記」聚焦於「讀史」，在當時的讀書筆記中顯然別具一格；追溯它的淵源，自當是乾嘉以來諸多以「讀史」為名的箚記之作。舉凡趙翼（1727-1814）《二十二史箚記》、潘永季（?-?）《讀明史箚記》、盧文弨（1717-1796）《讀史札記》、李慈銘（1830-1894）《越縵堂讀史札記》等，不一而足。它的撰寫方式，大抵是抄錄史料，排比文獻，以夾敘夾議方式記述所得所疑。或校勘字句、或考訂史實、或議論歷代興亡，或臧否人物是非，隨文宛轉，並無定格。而意圖「援古證今」，據所記史料而發抒一己之感懷者，也所在多有。新文學與白話文運動興起之後，此一書寫體類，每每以或隱或顯的方式，滲入「散文／雜文／小品文」及「述學文體」之中，成為共同的孳乳源頭。諸如魯迅、周作人（1885-1967）抒發讀書所感的短文，或是經史學家的學術論文，皆可見其餘影。由於所引述者多為古代史料，現代讀書箚記的文字遂不免於文白夾雜；它的類屬，亦經常游移擺盪於「散文／雜文／小品文」與「論文」之間，不易明確歸屬。[68]

66 按：周作人是臺靜農就讀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時的師長，新文學發展過程中，周作人也曾以各種不同形式撰寫過讀書筆記，然而臺靜農的白沙諸作與周並無關聯，原因有二，一是臺對周在抗戰期間的為人行事深不以為然，甚至撰寫〈「謝本師」周作人：老人的胡鬧〉一文予以抨擊。二是周作人的寫作風格沖和閒淡，與臺靜農白沙時期的文風迥然有別。故以下僅論臺與陳垣、魯迅兩人讀史之作的淵源。

67 清・潘耒，〈潘耒原序〉，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

68 以陳子善、秦賢次合編的《靜農佚文集》為例，十篇「白沙讀史箚記」中的〈紀錢牧齋遺事〉、〈讀《日知錄》校記〉、〈跋後漢兩碑文〉、〈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四篇便是被歸類為「論文」；其它六篇，列為「散文」。這些文章在體類歸屬上的曖昧性，由此可見。又按：〈瞻烏爰止，於誰之屋〉於《新蜀報・蜀道》初刊，以及臺靜農手書目錄時，皆作「瞻烏『仰』止，於誰之屋」，唯內文繕抄稿已將「仰止」校改為「爰止」。它與〈跋後漢兩碑文〉兩篇文章，後來被統整為〈錮黨史話〉一文，收入《靜農佚文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逮抗戰軍興，中原板蕩，讀書著述，每每成為諸多亂世知識分子的自我實踐之道；[69]此時「讀史」，無疑更有特殊意義。風雨如晦的年代裡，知識分子潛心細究過往的興衰治亂之跡，從「讀史」到「著史」、「論史」，[70]不僅攸關於文教保存，國族存續，更寓託了各自感時憂國的幽微心事。即以史學家陳垣為例，他在抗戰北平淪陷期間完成「宗教三書」，便是「皆外蒙考據宗教史之皮而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者也」。[71]自 1941 年底至北平光復前後的三、四年間，致力於撰著《通鑑胡注表微》；書成之後，自道該著作以「表微」為名，「即身之有感於當時事實，援古證今也」。[72]據此，學術論述也就一如文學書寫，同樣吞吐著抒情言志的個人幽懷。

陳垣是臺靜農就學於北大國學門時的師長，陳任職北平輔仁大學校長期間，延聘臺來校任教，同時擔任校長秘書，是臺靜農素來感念敬重的恩師。臺於戰時白沙撰寫「讀史箚記」，議論抒懷，相對直切，未必取法於「表微」，[73]卻很可能參考了陳垣早年的時論之文。陳垣青年時期支持革命，曾參與《時事畫報》的撰稿工作，當時發表不少文言短文，談古論今，即多從文史雜錄出發，進而自抒己見，頗多直白之言。如〈釋奴才〉一文藉考釋字詞源流而評論乾隆帝「操縱臣下之術亦神哉」；[74]〈讀金正希先生集〉藉表彰明末八比巨子金聲博納外來

69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陳垣便曾在致其三子陳約的信函中表示：若謂「讀書非其時」，「然則我輩捨讀書外，尚有何可做？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正是吾人向學要訣。」見陳垣，〈1931 年 12 月 6 月往函〉，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頁 946-947。羅常培撰〈臨川音系跋〉，亦表示：該書之作，乃因七七事變之後，自己「幽居在北平，閉門謝客，悲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來遣日。」羅常培，《羅常培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卷 1，頁 635。

70 錢穆著於抗戰期間的《國史大綱》，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論稿》，皆屬此類之作。

71 按：「宗教三書」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語見陳垣，〈1946 年 3 月 15 日（致楊樹達）往函〉，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 274。

72 陳垣，〈1945 年 1 月 31 日（致陳樂素）往函〉，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 1132。

73 陳於北平淪陷時期的「表微」之作，臺遲至 1946 年才得見，見臺靜農，〈1946 年 1 月 5 日來函〉，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頁 404。當時白沙地處大後方，政治氛圍不若淪陷區詭譎嚴峻，臺的感時論世之作，因此相對直切。

74 陳垣，〈釋奴才〉，陳垣著，陳智超編，《陳垣早年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2），頁 37-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宗教的見解，慨嘆當今「一孔之儒，猶有爭慕虛名，以異端相非毀，而不自知其國之不國者，以視先生之偉識何如也」。[75]〈郭亮哭李固〉、〈楊匡守杜喬〉[76]兩篇文章，以抗顏當朝權貴，遭致暴屍的後漢先賢，對照於當時為革命犧牲，同遭清廷暴屍的志士，或議論，或興嘆，雖無「讀史箚記」之名，卻已有其實。再者，陳後來治史教學，一向看重趙翼《二十二史箚記》與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並屢屢以之為指定教材。[77]臺先受教於門下，[78]後又與之共事，在現代文學尚未有聚焦於「讀史」的文學專集問世以前，臺於抗戰時期撰寫系列篇什，名之以「讀史箚記」，除了當時盛行的「讀史」之風，以及其個人史料編纂的工作因素之外，來自陳垣一脈的史學薰染，自是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臺靜農與魯迅的深厚淵源，早為眾所周知。魯迅重視野史雜說，認為它們雖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牠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79]他對於明代野史尤其看重，認為它與現今時局多有可堪參照之處。如他曾不只一次，在給朋友的信說到：

> 觀明末野史，則現狀之可藉以了然者頗多。[80]

> 偶看明末野史，覺現在的士大夫和那時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驚。[81]

此外，魯迅一方面將「雜文」書寫視為自己的「釋憤抒情」之作；[82]另一方面，也將其比擬為「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以為「作者的任務，是在對

75 陳垣，〈讀金正希先生集〉，《陳垣早年文集》，頁 96-98。

76 二文分別收入《陳垣早年文集》，頁 47-48、頁 49-50。

77 陳垣在輔大歷史系開授大學部三、四年級選修課「史源學實習」，該課程以趙翼《二十二史箚記》為教本，訓練學生逐一追尋史源，檢討然否。見〈私立輔仁大學二十一學年度學科報告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1933）。

78 臺靜農於北大國學門就讀期間，曾修習陳垣開授之「中國史學名著評論」，當時之授課講義，一直為其所珍藏，並且攜帶渡海來臺，現藏於臺大總圖書館，見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料 ntul_mf0003_0096。

79 魯迅，〈這個與那個・讀經與讀史〉，《華蓋集》（上海：北新書局，1929），頁 143。

80 魯迅，〈書信・270802 致江紹原〉，《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 12 卷，頁 59。

81 魯迅，〈書信・350108 致鄭振鐸〉，《魯迅全集》第 13 卷，頁 338。

82 魯迅，《華蓋集續編・小引》（上海：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1947），頁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83]戰鬥性格鮮明。臺靜農早年為魯迅編選《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特別提到：集印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在現在的專愛微溫，敷衍，中和，回旋，不想急進的中國人中」，最需要的，便是魯迅那種「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的精神。[84]白沙讀史諸文，時引野史雜說，並不乏感憤激切之言，或可由這些面向去理解。

循此細讀箚記諸文，就可以看出：就所讀之史料範圍而言，〈士大夫好為人奴〉、〈談薙髮〉、〈紀錢牧齋遺事〉所引述之史事，多有與《亡明講史》一氣相通之處；〈跋後漢兩碑文〉、〈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評述後漢黨禍與覆亡之因；〈秀才〉、〈關於買賣婦女〉、〈關於販賣生口〉引述南宋史事，亦皆源出臺所寓目之兩漢南宋史料。唯獨〈歷史之重演〉，乃因閱讀時人陳登原（1900-1975）《歷史之重演》一書而發，它所以被納入「讀史箚記」系列，十分值得注意。以下便以它作為起點，說明「箚記」諸文的現代轉型，以及其間的現實關懷。

《歷史之重演》雖是新出之作，全書主旨，卻是經由多方汲引史料文獻而論證「歷史」之於當代的重要意義。臺所據以抒論的〈歷史由沿襲古之言語而重演例〉一章，即從「言語」之重演，連繫到人事遭逢之重演。該章以「不聞惡不可為善亦難為乎」一語發端，繼而引述《後漢書・范滂傳》、《南史・劉湛傳》記述范、劉於行將赴死前關於「為善」與「為惡」的言語，[85]感慨道：

> 漢人故語，南北朝人固沿襲之矣；其在今日，豈無沿襲之者哉？[86]

臺靜農針對陳所引述之語例，表示「陳君所言，似尚未盡」，為之補上《世說新語・賢媛》「趙母嫁女」條「好尚不可為，尚其惡乎」的記載，並且感嘆：

---

83 魯迅，《且介亭雜文・序言》（上海：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1947），頁 7

84 臺靜農，〈序言〉，臺靜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北京：未名社，1926），頁 2。

85 范滂「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編，《新校本後漢書並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77），卷 97，頁 2207。又，據《南史》所載，劉湛之在獄中而見弟也，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 35，頁 910。

86 陳登原，〈歷史由沿襲古人言語而重演例〉，《歷史之重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趙母的命運大概同袁熙之妻甄夫人相似。故當其女兒出嫁時，想到自己便是後一代的鏡子，而這樣的心情，正和黨錮名賢范孟博遺囑一樣的沈痛。然而那少男少女又如何能夠了解呢？一旦了解過來時，恐怕已經踏上自己父母的足跡了。[87]

同時，又據劉孝標引《淮南子》之注文，補充說明：「趙母的故事，也是沿襲來的」，「足見這幾句話來源甚古，在范孟博（137-169）以前的西漢人就感受到了」。最後，再次引述陳登原文中的「其在今日，豈無沿襲之者哉」，作為全文總結。[88]此一書寫形態，涵括了對史料的引述、排比、補正，以及一己的詮解與感發，可謂既承衍明清以來趙翼等人「讀史箚記」的體式，又有個人感喟；所體現的，正是傳統箚記書寫的現代轉型。而篇目所揭櫫出的「歷史之重演」，更不妨視為臺靜農箚記諸文的總體關懷所繫。

〈歷史之重演〉一文發端於黨錮名賢范滂的遺言；著重的雖是政爭之中，個人於「善／惡」之間的進退躊躇，然而東漢因黨禍而覆亡一事，實讓臺靜農深感痛心。箚記中〈跋後漢兩碑文〉、〈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兩篇文章，即是著墨於此。[89]相對於范滂等人身處艱難猶寧死不屈，臺念茲在茲且痛心疾首的「重演」，主要集中於政權動盪之際，飽讀聖賢詩書的知識分子不但缺乏氣節操守，甚至還見風轉舵，醜態畢露。即以〈秀才〉為例，臺引述《三朝北盟會編》的記載，提到：

> 金人索太學生博通經術者，……太學生皆求生附勢，投狀願歸金國者百餘人，……比至軍前，金人脅而誘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文義策論，各要汝等陳鄉土方略利害。」諸生有川人、閩浙人者，各爭持

87 臺靜農，〈歷史之重演〉，《新蜀報・蜀道》第 68 期（1940 年 3 月 11 日），署名聞超。後收入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頁 383。

88 同上註。

89〈跋後漢兩碑文〉與〈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兩篇文章早在 1940 年即已發表，但 1946 年臺靜農另有一篇以〈黨錮史話〉為題的文章，發表於上海《希望》月刊第 2 卷第 4 期，文分三部分，其中第二、三部分，便是前述這兩篇文章；第一部分則是從《後漢書・五行志》談到黨錮之禍，由此帶出先前的這兩篇文章。其對東漢因黨禍而覆亡一事的重視，由此可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執筆陳山川險易，古今攻戰據守之由以獻。

進而諷刺：

> 看來當時宋高宗忽爾陸地忽爾海道的逃來逃去，與這一群秀才「爭持紙筆陳山川險易」不為無功。[90]

秀才如此，入仕為官的士大夫，更是厚顏無恥，一旦政權更易，便為一己之私而變節賣身。無論是吳三桂（1612-1678）幕下自甘賣身事奉新主的知府馮甦（1628-1692）（〈士大夫好為人奴〉）、滿清入主中原之後，率先自行薙髮並上疏請下「削髮令」的漢奸孫之獬（1591-1647）（〈談薙髮〉），抑或是清豫王入南京，首倡迎降並敬獻貢禮的禮部尚書錢謙益（1582-1664）（〈紀錢牧齋遺事〉），莫不是臺靜農嘲諷撻伐的對象。而臺之所以一再對這些歷史上的無恥士人撻之伐之，無非是意欲「援古以證今」——〈談薙髮〉文末，臺靜農語帶譏諷，以微辭批評今之「猴冠」者忘其祖國；[91]〈紀錢牧齋遺事〉，更以〈附記〉明白表示：

> 今日的時勢，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和晚明相比，而比跡於錢牧齋者，卻偏有其人，反正經不起霜雪的瓦，遇了微風也會裂的，——這沒有用的東西，只有讓他裂罷。[92]

可見得士人之趨炎附勢，厚顏無恥，並於古今歷史不斷重演一事，實為臺靜農「箚記」的關懷主軸。除此之外，他所關注的「重演」，至少還包括了兩點：一是為政者的「文網」，二是加諸於婦女與弱勢者的不公平制度。〈讀日知錄校記〉一文指出：顧氏該書之所以有不同版本，實因亭林弟子潘耒（1646-1708）

90 臺靜農，〈秀才〉，《新蜀報・蜀道》第 70 期（1940 年 3 月 13 日），署名釋耒。後收入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84。

91 臺靜農，〈談薙髮〉，《星島日報・星座》第 354 期（1939 年 7 月 28 日）。後收入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81。

92 臺靜農，〈紀錢牧齋遺事〉，《七月》第 5 集第 4 期（1940 年 10 月），頁 173-174，署名孔嘉。後收入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4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畏於清廷文網，不得不為之削改。[93]〈紀錢牧齋遺事〉提到《痛史》本中有諸多「諷刺詩」：

> 諷刺的著眼處，乍看去是專為牧齋寵柳如是而發，細讀又不盡然，——這理由很簡單，文網之下，不得不含晦其辭也。[94]

不止於此，臺還特別提到，謙益鄉人王應奎《柳南隨筆》初版時原載有一份錢謙益朝見清豫王時所獻納的貢品清單，後來的刻本卻將它刪去，原因同樣是「文禁」。[95]臺在編譯館負責編纂宋代社會史料，「文網錄」尤為其中大宗，關注清代「文網」，原是良有以也。

也正是因為編纂宋代社會史料，1940 年 5 月，臺靜農以筆名「孔嘉」，在重慶《新蜀報・蜀道》連續發表的〈關於販賣生口〉與〈關於買賣婦女〉兩篇文章，就都是引述宋代相關史料的「援古以證今」之作。前者以《宋會要》多條記載為據，指出南宋偏安時期，實有不少人藉走私販賣流人婦女而「發國難財」。這些「浮浪不逞之人，規圖厚利，於恭州涪州瀘州與生口誘略良民婦女，或於江邊用船津載，每船不下數十人」。官方雖屢下禁令，仍無法遏止。臺因此感嘆：

> 南宋十六路中無告之流民婦女，皆有被充生口販賣之可能，正如民族抗戰中的今日，而大部分的老百姓之生命線皆繫之於走私的「發國難財者」之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千古同轍，不足為奇也。[96]

事實上，臺靜農所以屢屢抨擊「發國難財者」，根源乃在於對弱勢流人婦女的

93 臺靜農，〈讀日知錄校記〉，《抗戰文藝》第 7 卷第 2-3 期（1941 年 3 月），頁 204-205，署名孔嘉。後收入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9-404。

94 臺靜農，〈紀錢牧齋遺事〉，頁 404。

95 臺靜農，〈紀錢牧齋遺事〉，頁 408-409。據該文所述：乾隆三十四年時，錢牧齋所有的著作都被毀版，不特牧齋在別人書上的序文不容流傳，就是凡有「錢謙益」三個字的也得剜去，所以初版以後的《柳南隨筆》才失落了牧齋的貢品單。

96 臺靜農，〈關於販賣生口〉，《新蜀報・蜀道》第 131 期（1940 年 5 月 28 日），署名孔嘉。後收入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情與關懷。此一關懷，同樣見諸〈關於買賣婦女〉。臺引述《名公書判清明集》，根據其中若干南宋名公的判詞，說明當時婦女命運身不由己，甚至還被當作貨品，多次典當買賣。當時有所謂「雇賣」者：

> 即後來典當的辦法，特展轉典賣，斯為奇耳。有如今日從事國難生意者，往往一轉手間，獲利數倍，真好買賣也。[97]

在臺靜農看來，無論是士人之無恥，抑是「發國難財者」之欺壓弱勢者，莫不是「千古同轍」，是歷史的一再「重演」。一系列的「白沙讀史箚記」，遂以此為臺靜農在編譯館時期的「讀史」，銘刻下感時憂世的時代印記。

六、從「白沙讀史箚記」到《龍坡雜文》——「國立編譯館時期」與臺靜農渡海後的文學書寫

「白沙讀史箚記」最後雖然並未結集出版，但它所體現出的關懷取向與行文風格，卻是與臺靜農同一時期的「史料轉向」，共同隨著他渡海來臺，轉化為日後《龍坡雜文》與諸多學術論文的內在肌理。

檢視《龍坡雜文》，依其內容性質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閱讀觀覽各類文史篇什與畫作的札記感想，如〈詩人名士剽劫者〉、〈隨園故事鈔〉、〈夜宴圖與韓熙載〉、〈書「宋人畫南唐耿先生煉雪圖」之所見〉、〈遼東行〉；二是自敘、懷人與憶舊之作，如〈我與書藝〉、〈始經喪亂〉、〈記波外翁〉、〈記「文物維護會」與「圓臺印社」〉、〈傷逝〉等；三是為各類出版品所作的序文，如〈「病理三十三年」序〉、〈「陶庵夢憶」序〉、〈「詩人與詩」序〉、〈「說俗文學」序〉等。[98]其中第一類，正不啻為「白沙讀史箚記」的延擴與轉化。

這一類札記感想，都因閱讀文史記載或觀覽畫作而發。所讀所觀，當然已

97 臺靜農，〈關於買賣婦女〉，《新蜀報．蜀道》第 132 期（1940 年 5 月 29 日），署名孔嘉。後收入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390。

98 按：第二類篇什的寫作，其實也早在渡海之前即開啟端緒。1938 年 11 月 25 日，臺靜農在《時事新報．青光》第 4 版發表〈記張大千〉，即可視為此類懷人之作的先聲；此後還有〈我與老舍與酒〉，刊載於《抗戰文藝》第 9 卷第 3、4 期合刊（1944 年 9 月），亦屬此。至於第三類「序文」之屬，臺的〈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序言〉一文，更是早在 1926 年即已發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不再局限於史料文獻；所思所感，也無關於「歷史之重演」。然而，即或所閱讀的文本涵括多類文學藝術篇什，臺靜農的行文仍採夾敘夾議方式，多方勾連各種文獻記載，或考訂事物之然否始末，或評述古人古事，或藉以論事抒懷，它是古代讀書札記之書寫傳統的一脈相承，也承接「白沙讀史箚記」，以白話書寫，體現遊走於「散文／雜文」與「學術論文」之間的行文風格。如〈詩人名士剽劫者〉，副題為「讀世說新語札記」，便是取《世說》所載石崇（249-300）、戴淵（271-322）、祖逖（266-321）三人紀事並鈔，指出三人「皆晉代勝流，可是都搶劫有案」。「比較看來，三人行劫的動機與目的，並不相同，而以石崇最為惡劣」。究其所以，則是「司馬氏的政風培育出的行為」。[99]〈隨園故事鈔〉鈔錄《批本隨園詩話》中的批者紀事，或考究源流，或予以點評。如「古剌水」一節，提到袁枚（1716-1798）曾為家藏之「古剌水」做過來源考證，《詩話》批者補足其說，臺復就此多方引證，探其究竟。[100]「隨園」一節，引錄子才之孫祖志〈隨園瑣記〉記載太平天國攻下南京時，「不僅隨園不保，家人也有死亡」，臺進而抨擊清廷顯貴：

> 而可恥的，清廷顯貴對於詩人的隨園，還想乘火打劫。[101]

此外，〈遼東行〉憶及抗戰後，囑託友人代為搜買碑搨本，見到唐代搨本造像人祈求征戰者平安歸來的片紙文字，不禁感嘆：

> 此片紙即夾在數十種豐碑搨本中的，經過八年之久被侵掠的戰爭之後，看到這一造像人的祈求，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觸。這為人妻子的僅僅一句話一個願望，竟吐出了一千多年後的侵掠者與被侵掠者人民的悲號與無力的控訴。[102]

這些感嘆，與前述讀《世說》與《批本隨園詩話》之批判當權者，都源自於對「被欺侮與被損害」者的同情；基本關懷，多與「白沙」諸作一氣相通。不過，正因為所讀文本已不限於史料文獻，《龍坡雜文》中的讀書札記，乃得以匯通

99 臺靜農，〈詩人名士剽劫者〉，《龍坡雜文》，頁 46-47。
100 臺靜農，〈隨園故事鈔．古剌水〉，《龍坡雜文》，頁 258-260。
101 臺靜農，〈隨園故事鈔．隨園〉，《龍坡雜文》，頁 237。
102 臺靜農，〈遼東行〉，《龍坡雜文》，頁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類文史資料，既觸處成趣，「麟爪見風雅」，[103]又多能回歸文學，開啟文學閱讀的另類視野。如〈遼東行〉，雖始於見搨本文字而批判唐太宗（598-649）窮兵黷武，征伐遼東，其後重心卻是從評述唐太宗、隋煬帝（569-618）的征遼之作，談到金昌緒（?-?）、王建（767-830）的閨怨詩；最後再引錄「海山記」中的〈挽舟者歌〉，根據它作出結語：

> 此歌出「海山記」，「海山記」是以煬帝為主題的傳奇，傳奇中的詩歌，向不被專家所重視，這真是一首有血淚的作品，不特足為「無向遼東浪死歌」的注腳，也答覆了本造像人劉樊氏的期待。[104]

這正是從詩歌與「傳奇」的文學視角，批判隋唐帝王好大喜功，造成無辜人民鉅大傷痛。另如〈書「宋人畫南唐耿先生煉雪圖」之所見〉，從所見之「宋人畫南唐耿先生煉雪圖」與《故宮圖畫錄》相關記載談起，博引正史雜錄，一方面考證女冠「耿先生」其人與「煉雪」神話；另一方面，又從唐代道教煉丹與女性的關係，論及所涉及的文學詩詞，其要旨，卻是批判《花間集》作者，為女性發不平之鳴。因此不但文末特別提到：

> 《花間集》中的「女冠子」就有十九首之多，作者都是一時的顯貴。……這十九首「女冠子」的共同風格，極綺豔，極輕浮，詞人眼中女冠子的身分是可想像的了。將清虛的境界，變作北里之倡風，是當時名公巨卿淫樂生活的寫照，又是無辜女子的脂粉地獄之變相耳。

更加註「附記」：

> 唐代法律對女冠約束力甚嚴，而女冠的行為竟是那樣的不堪；但女冠多是無辜無告的女子，沒有力量敢甘犯法禁，而法律約束不了的，正是韋相公、張舍人、牛給事、孫少監、毛秘書輩。（此皆花間集中女冠子的作者）。[105]

103 見張淑香，〈麟爪見風雅——談臺靜農先生的《龍坡雜文》〉，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 255-299。

104 臺靜農，〈遼東行〉，《龍坡雜文》，頁 35。

105 臺靜農，〈書「宋人畫南唐耿先生煉雪圖」之所見〉，《龍坡雜文》，頁 13-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篇文章從所觀覽的畫作起筆，兼引史書雜錄、道教傳說與文學詩詞，從而在女性關懷之外，揭示《花間集》與唐代女冠之間的關係，意到筆隨，既是精彩的現代雜文書寫，也為唐代文學史的研究別開戶牖，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循此，我們或可進一步體認「國立編譯館時期」之於臺靜農的意義。本來，文學創作與文學史研究，是臺自 1920、30 年代以來，一直戮力為之的志業。入川之初，他曾致函當時的教育部司長吳俊升（1901-2000），信中提到，自己將為教育部編寫青年讀物，但仍希望同時從事文學史稿的撰寫：

> 茲將靜農之「青年讀物編輯計劃表」奉呈，惟擬編之書，屬於文藝歷史範圍，除文筆渲染外，尚須加以考證，擬先行搜集材料，然後著筆。……
>
> 日前面陳欲整理一舊著文學史稿，當荷　俞允，並擬借此時間進行。[106]

這封信顯示：「編輯青年讀物」所需之「文藝歷史範圍」的考證，原非臺靜農所熟諳，故須「先行搜集材料，然後著筆」。倒是整理「舊著文學史稿」，才是一以貫之的學術志業。因緣際會，1939 年 9 月起，他入職為國立編譯館編譯，隨即展開為時三年多的社會史料整理工作。這段時日裡，他多數時間遠離家小，潛心在館研讀史料。只是，儘管館內得以坐擁書城，遊心縱目於上下古今，館外卻是遍地烽火，社會亂象蠭起；知識分子隨波逐流，甚至媚外事敵者，所在多有。臺於此一時期的小說、劇本之作，語多激憤，讀史而慨嘆「歷史之重演」，發為系列箚記，亦是不能自已。

時移勢易，渡海之後，外在大環境已不同於戰時白沙。告別埋首於故紙堆中的史料編纂，臺靜農再次回到他的本職：在大學中文系從事中國「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即或如此，曾經寓目抄錄的各類史料、「以類相從」的編纂習慣，卻正如同護花的春泥，滋養著他此後的雜文寫作與學術研究。雜文方面，《龍坡雜文》中的談文論藝與讀書札記諸作，從關懷面向到行文風格，皆與「白沙讀史箚記」相通相貫而又多有開展。兩相參照，不難看出：「龍坡」雜文出入於文史藝術之間，終究還是歸於文學本位；儘管渡海前的「悲心」依舊，他卻

106 臺靜農，〈致教育部司長吳俊升函〉（1938 年 8 月 4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後收入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頁 4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以蘊藉圓融的觀照，轉化了戰時「白沙」陰鬱怨懣的「憤心」。[107]學術研究方面，臺靜農生前唯一結集出版的學術論集《靜農論文集》，兼收渡海前後諸作，展現淵通開闊之學術視野的同時，其間的差異性、延續性與關聯性也隨之浮現。這批結集的論文，除〈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一文發表於入川之前，其餘各篇皆為戰時白沙與來臺後所撰。其中，撰寫於渡海之前的〈兩漢書簡史徵〉、〈南宋人體犧牲祭〉、〈南宋小報〉等文，所論述的議題，大多超溢一般文學研究的界閾，延展出簡牘、民俗學與人類學等面向，顯然是任職編譯館時，大量閱讀積累而衍生的成果。〈兩漢樂舞考〉雖發表於渡海之後，成篇卻在渡海之前；所關注的「樂舞」研究，前可溯及早年參與北大「歌謠研究會」與廈大時期所撰〈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往後則連結到來臺後有關民間樂歌與戲樂的論述。[108]它之所以成篇，同樣與在編譯館處理大量兩漢史料有關。[109]臺灣時期發表的論文如〈魏晉思想論述〉、〈論唐代士風與文學〉、〈論碑傳文及傳奇文〉等，則又回到以「文學史」為主軸的研究，並增益對於社會風氣、當代思潮的全面觀照，體現出文史交融，博雅淵通的特色。此一觀照視角，一方面固然來自臺靜農對文學史研究方法論的自覺，[110]另一方面，自當歸功於編譯館史料工作的積累。

107 「悲心」與「憤心」原是樂蘅軍教授論析臺靜農小說《地之子》與《建塔者》所提出的論點，「悲心」聚焦於《地之子》，言其關懷弱勢小人物的悲憫之情，「憤心」為眼見社會之不公不義而興起的義憤之心。在此借以論其雜文。見樂蘅軍，〈悲心與憤心：談臺靜農先生兩本小說中的生命情懷〉，樂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頁 393-411。

108 臺靜農在臺灣發表的學術論文皆集中於《靜農論文集》，全書第一篇〈兩漢樂舞考〉初稿乃完成於白沙時期。陳垣原希望他能交由《輔仁學報》發表，臺告以臺大當時有新創刊之學術雜誌需要稿件，遂投交《臺大文史哲學報》創刊號刊載。此外，〈兩漢書簡史徵〉亦完成於編譯館時期，始終不曾發表，直到編輯出版《靜農論文集》，才收入其中。來臺後，臺靜農曾撰寫多篇有關民間樂歌與戲樂的論述，包括：〈談臺灣歌謠〉，刊於《遠風》第 1 期（1947 年 4 月），頁 37-38，署名孔嘉、〈《解金貂》與《溫柔鄉》（上）〉，刊於《大陸雜誌》第 1 卷第 4 期（1950 年 8 月），頁 13-15、〈《解金貂》與《溫柔鄉》（下）〉，刊於《大陸雜誌》第 1 卷第 5 期（1950 年 9 月），頁 18-21。

109 參見臺靜農，〈靜農論文集．序〉，《靜農論文集》，頁 i-ii。

110 有關臺靜農文學史方法論的論析，參見梅家玲，〈動盪時代的史識與詩心——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23），頁 45-1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七、結語

1942 年 11 月，臺靜農離開編譯館，改赴白沙國立女子師院任教。不同於編譯館時期的獨學無友，師院中教學相長，除卻各類學生活動，同事中既有魏建功、李霽野、柴德賡等故友，又有黃淬伯、方管（舒蕪）等新知，彼此往還的點滴，共事的情誼，先後披露於各人的追憶文字之中。[111]師院生活，因此成為臺靜農川中時期最為人熟知的部分。

然而，若就「學思歷程」發展的面向看來，此前的「國立編譯館時期」雖然短暫，對於臺靜農而言，意義卻可能遠比師院時期來得重大。那是始經喪亂，顛沛入川之後，一段生活相對安定，精神卻憂憤躁鬱的歲月。烽火連天的時日裡，臺靜農一如陳垣等人，以讀史寫作，作為知識分子的自我實踐之道。史料整理之於臺靜農，因此並不只是戰時的謀生之具，反而是詰究興亡，扣問名教的津梁。潛心讀史之餘，他藉由「讀史箚記」進行系列雜文書寫，批判士人之無恥，慨嘆歷史之重演，無非是援古證今，釋憤抒情。他的古典詩寫作始於此時，自是不難理解。此外，博古通今，中外兼融的閱讀取向，則使得他的學術研究，既產生明顯的「史料轉向」，也開啟傳統文學研究之外的不同觀照面向。可以說，正是由於國立編譯館時期的閱讀積累，為臺靜農厚植學養，開拓視野；而「箚記」的書寫磨礪，更讓他另闢出一條融貫傳統與現代的文學寫作路徑。「國立編譯館時期」為渡海前的臺靜農開通了廣納史料文獻的治學之道，讓這位曾經戮力於新文藝的青年作家重回歷史傳統，從而融會轉化，逐漸醞釀出會通古今的文學研究與書寫實踐。唯其經由這一時期的沈潛與淬鍊，渡海後的臺靜農，才得以厚積薄發，另締新猷。於是，我們也才得以理解：渡海前後，臺靜農從來不曾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他的創作與研究從來不曾斷裂，不曾分流，而是負載著時代的風雲動盪，從中國大陸出發，一路走過政爭，走過戰亂，最後在臺灣落地生根。他以悲心與憤心回應了多難的現代中國，又以歷經無數創傷、協商與轉化後的史識與詩心，成為滋養新一代臺灣文學與文化的泉源。

111 參見李霽野、柴德賡、舒蕪等人的追念文章，俱見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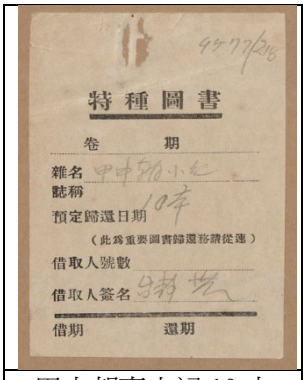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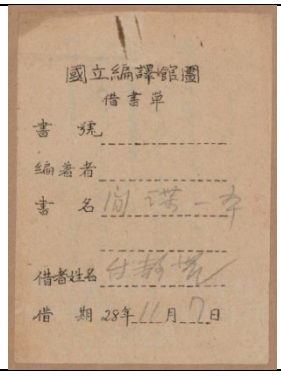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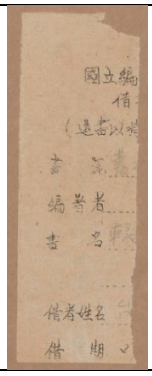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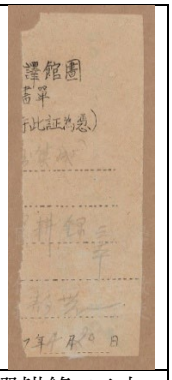
			
甲申朝事小記 10 本（館藏編號：ntul_mf0003_0132-160）	間諜（館藏編號：ntul_mf0003_0132-435）	叢書集成・輟耕錄 三本（館藏編號：ntul_mf0003_0132_429 ntul_mf0003_0132_426）	

圖 1　國立編譯館圖書室借書單舉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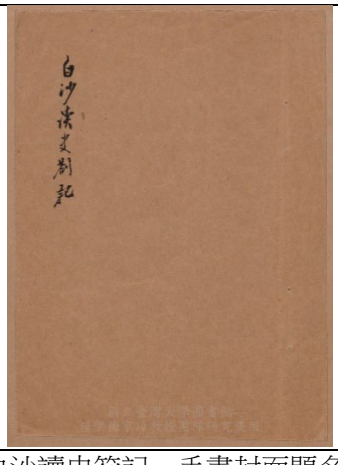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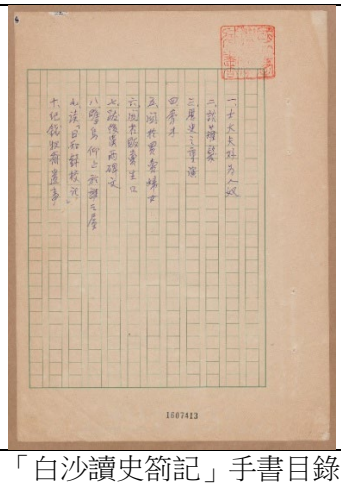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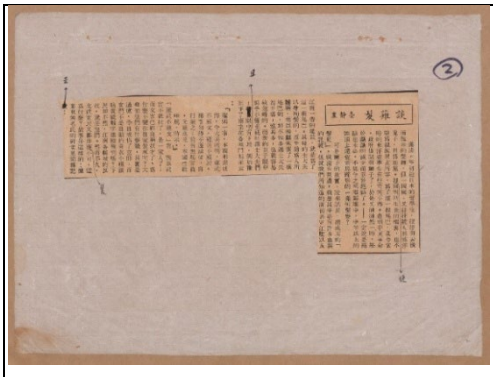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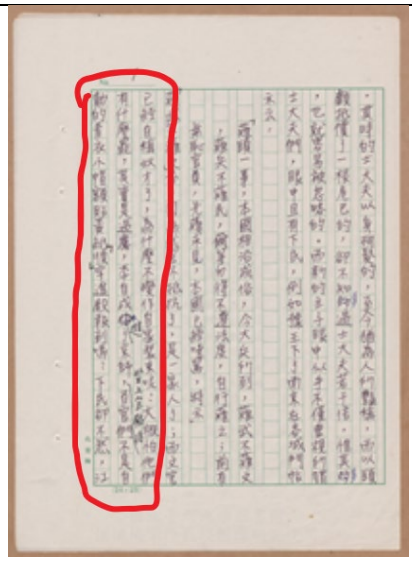
	
「白沙讀史劄記」手書封面題名（館藏編號：ntul_mf0003_0173-001）	「白沙讀史劄記」手書目錄（館藏編號：ntul_mf0003_0173-003）

圖 2　臺靜農手書之「白沙讀史劄記」封面及目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談薙髮〉剪報校訂
（館藏編號：ntul_mf0003_0172-002）



〈談薙髮〉繕寫稿修改
（館藏編號：ntul_mf0003_0173-009）

圖 3 「白沙讀史劄記」之剪報校訂及繕寫稿修改舉隅（紅框為筆者所標示，框內文字可見其修改之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南朝宋・范曄著，楊家駱編，《新校本後漢書並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77。

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二、近人論著

〈私立輔仁大學二十一學年度學科報告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1933。

〈國立編譯館圖書館近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 14 卷第 1 期，1939 年 7 月，頁 19。

〈國立編譯館組織規程〉，《國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公報》第 4 期，1940 年 6 月，頁 15。

〈國立編譯館十四年來工作概況〉，《科學》第 29 卷第 5 期，1947 年 5 月，頁 153。

〈教育部登記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分發服務及待遇辦法〉，《教育通訊》1938 年第 9 期，頁 12。

王德威，〈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1 期，2009 年 12 月，頁 1-46。

古有成選譯，《挪威短篇小說集》，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岑家梧，〈槃瓠傳說與傜畲的圖騰崇拜〉（未完），《責善》第 2 卷第 7 期，1941 年 6 月，頁 2-8。

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北平：來薰閣書局，1941。

李源澄，〈論元魏之大家庭〉，《文史雜誌》第 1 卷第 11 期，1942 年 5 月，頁 17-30。

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臺北：洪範書店，1991。

胡喜云，〈國立編譯館在北碚〉，《書屋・人物春秋》2019 年第 12 期，頁 25-29。

———，〈從「總領譯事」到掌理學校書圖編譯——國立編譯館研究〉，《安徽史學》2020 年第 4 期，頁 102-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蘭，〈論騎術入中國始於周末〉，《文史雜誌》第 1 卷第 3 期，1941 年 5 月，頁 17-26。
張政烺，〈玉皇姓張考〉，《責善》第 1 卷第 8 期，1940 年 6 月，頁 6-12。
梅家玲，〈動盪時代的史識與詩心——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23。
章士釗，〈創辦國立編譯館呈文〉，《甲寅周刊》第 1 卷第 5 期，1925 年 8 月，頁 1-2。
許霖，《鶴唳猶傳建塔心：臺靜農的文學與思想》，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彭明偉先生指導，2023。
陳子善、秦賢次編，《我與老舍與酒：臺靜農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陳子善、秦賢次編，《靜農佚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
陳垣著，陳智超編注，《陳垣早年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2。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陳登原，《歷史之重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陳獨秀著，臺靜農先生遺稿及珍藏書札編輯小組編，《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
舒乙，〈老舍四大皆空的日子〉，《國學》2013 年第 1 期，頁 32-33。
舒紀維，〈國立編譯館圖書室的工作〉，《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 16 卷第 5-6 期，1942 年 6 月，頁 8-9。
黃立斌，〈臺靜農在「國立編譯館」〉，《隨筆》2022 年第 6 期，2022 年 6 月，頁 54-63。
楊向奎，〈論中古時代之譜牒與刑〉，《文史雜誌》第 1 卷第 11 期，1942 年 5 月，頁 13-16。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臺靜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北京：未名社，1926。
臺靜農，〈中國文學起原之研究〉，《平等》第 1 卷第 1 期，1931 年 3 月，頁 1-5。
———，〈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歌謠》第 2 卷第 16 期，1936 年 9 月，頁 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致教育部司長吳俊升函〉，1938 年 8 月 4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記張大千〉，《時事新報・青光》第 4 版，1938 年 11 月 25 日。
———，〈談薙髮〉，《星島日報・星座》第 354 期，1939 年 7 月 28 日。
———，〈士大夫好為人奴〉，《星島日報・星座》第 355 期，1939 年 7 月 29 日。
———，〈歷史之重演〉，《新蜀報・蜀道》第 68 期，1940 年 3 月 11 日。
———，〈秀才〉，《新蜀報・蜀道》第 70 期，1940 年 3 月 13 日。
———，〈關於販賣生口〉，《新蜀報・蜀道》第 131 期，1940 年 5 月 28 日。
———，〈關於買賣婦女〉，《新蜀報・蜀道》第 132 期，1940 年 5 月 29 日。
———，〈紀錢牧齋遺事〉，《七月》第 5 集第 4 期，1940 年 10 月，頁 173-174。
———，〈跋後漢兩碑文〉，《新蜀報・蜀道》第 267 期，1940 年 10 月 28 日。
———，〈讀日知錄校記〉，《抗戰文藝》第 7 卷第 2-3 期，1941 年 3 月，頁 204-205。
———，〈關於《西遊記》江流僧本事〉，《文史雜誌》第 1 卷第 6 期，1941 年 6 月，頁 51-53。
———，〈南宋小報〉，《東方雜誌》第 39 卷第 14 號，1943 年 9 月，頁 39-40。
———，〈我與老舍與酒〉，《抗戰文藝》第 9 卷第 3-4 期，1944 年 9 月，頁 11。
———，〈南宋人體犧牲祭〉，《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學術集刊》第 1 期，1945 年 8 月。
———，〈黨錮史話〉，《希望》第 2 卷第 4 期，1946 年 10 月，頁 277-279。
———，〈談臺灣歌謠〉，《遠風》第 1 期，1947 年 4 月，頁 37-38。
———，〈《解金貂》與《溫柔鄉》（上）〉，《大陸雜誌》第 1 卷第 4 期，1950 年 8 月，頁 13-15。
———，〈《解金貂》與《溫柔鄉》（下）〉，《大陸雜誌》第 1 卷第 5 期，1950 年 9 月，頁 18-21。
———，《龍坡雜文》，臺北：洪範書店，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臺靜農著，許禮平編，《臺靜農詩集》，香港：翰墨軒出版公司，2001。
臺靜農，《亡明講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臺靜農著，梅家玲主編，《史識與詩心——臺靜農精選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
魯迅，《華蓋集》，上海：北新書局，1929。
———，《且介亭雜文》，上海：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1947。
———，《華蓋集續編》，上海：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1947。
———，《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賴柏霖，《臺靜農先生小說研究》，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齊益壽先生指導，2019。
魏洪禎，〈唐代門閥及其衰落之原因〉，《責善》第 1 卷第 21 期，1941 年 1 月，頁 13-16。
羅榮宗，〈古史今證：史實研究之商榷〉，《史地教育特刊》創刊號，1942 年 10 月，頁 1-5。
———，〈水西苗胞歌謠的研究〉，《國力》第 2 卷第 9-10 期，1942 年 10 月，頁 11-13。
羅常培，《羅常培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三、資料庫

臺灣大學總圖書館特藏資料：臺靜農，ntul_mf0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